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

叶自成 王日华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基石。庄子用“百家之学”,司马迁用“百家之言”、“百家之说”、“百家之书”、“百家之术”等概念来形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盛况,我们现在称之为“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包含哲学、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及不同流派,其中也包括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及不同流派。此前,笔者曾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了比较^①,并试图采用当代国际政治学通用的话语来阐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以期把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推向一个可供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行对话的平台。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作进一步的比较和研究。

• 人们通常认为,1618—1648年西欧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但实际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就大多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性质。当时,各诸侯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人口,独立决定和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国家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早于西欧体系的华夏体系。参见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页。

① 同上文,第24—29页。

《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总第6期),第113—132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的分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名、法、道、阴阳等流派互相争辩,各擅胜场。他们“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万物、人事,纵论古今”,其著作大都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①自然地,其中很多流派都详细论述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思想。

然而,外交思想能不能按照儒、墨、名、法、道、阴阳等来划分呢?完全遵照这种方法分类显然不太合适。第一,传统的分类方法主要以思想家的哲学观和政治主张为标准来划分各个流派。但是,在具体的思想上,各流派内部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差别还很大。^②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外交思想不仅包括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和主导原则,还包括具体的策略和手段;在同一个战略目标下面,可以选择多种策略或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第二,与一般的哲学思想和治国理念不同,外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实力的影响。小国和大会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治国理念、法治思想、民本思想等,但小国和大会的外交思想通常差别很大,小国一般特别关注国家安全,而大国往往寻求霸权。第三,国际形势的发展会对外交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权力由盛而衰,而有些诸侯国却由弱变强,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外交思想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

对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分类需要运用当代国际政治学的通用话语,把中国外交思想纳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知识谱系内来进行研究。当代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形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普适性的知识体系。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观点,但许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我们认为,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按照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知识体系的通用术语来进行分类整理应该是可行的,希望本文的分类整理能为进一步把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系统化和提出可供实证的理论命题作出贡献。

^①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② 比如,韩非子就有“儒八墨三”之说。《韩非子·显学第五十》,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4—1125页。下引《韩非子》均出自该书。

二、春秋战国的六大外交思想流派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产生了多个不同的流派。尽管流传至今的很多典籍都是西汉以后才整理和加工出来的,不仅作者和成书年代难以考证,而且掺杂了一些后人的思想,但这并不妨碍后人把它们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来加以讨论。需要指出,春秋和战国虽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但这一时期外交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以下分别对主要的外交思想流派进行分析。

(一) 管仲与霸权学派

《管子》内容庞杂,涉及法家、儒家、道家等多个不同流派。^①然而,其中的霸权学说却与管仲治齐的外交政策高度一致,与《国语》、《左传》等典籍中涉及管仲和齐国的记载相呼应,可以认为《管子》记叙了管仲治理齐国的外交思想。因此,我们在这里把管仲治齐和《管子》记载的霸权思想联系起来考察。

管子霸权论的核心是维护周礼规定的秩序。管子认为,中原诸侯都应该在周礼的框架下,继续保持与周王室的传统关系,尊重周王室。尽管周王室已经衰落,实力不如一些大的诸侯国,但还应该承认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等级秩序。诸侯国应该继续承担对周王室的义务,尤其是根据分封制确定的义务,保护周王室安全,阻止外夷对周王室和中原诸侯的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

要想维持周礼规定的秩序,就需要各诸侯国的合作,诸侯国一般通过盟会来进行多边合作。齐桓公在位期间,曾经发起九次大型盟会。盟会的主要目的是组成大国同盟,“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②。另一方面,盟会也是协调大国出兵、惩罚抗击夷狄、保护周王室的军事会议。然而,盟会机制不会自动生成,也不是总能顺利实施,盟会需要霸权国的主导和推动。

^① 《管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存在着诸多的争论,目前国内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同该书不是管仲本人所写,而且“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63页。

^② 《春秋谷梁传·庄公》,承载:《春秋谷梁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霸权的基础在于国家富强。管子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①但是，管子并不认为国家富强就必然能够获得霸权。影响霸权的因素还有客观地缘环境和主观政策，而政策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地理位置是成为霸权国的客观条件，管子说：“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②周边邻国实力分布状况是影响霸权的客观战略环境，管子把国家分为大国（万乘之国）、中等国（千乘之国）和小国（百乘之国）三类。前有大国、后有中等国的国家可以称之为“抵国”，前有中等国、后有大国的国家就称为“距国”（国土呈正方形），四面都受敌的国家叫“衢国”。大国如果处于“衢国”的地缘环境中，就难以获取霸权。

管子把外交看做成就霸权的重要手段，合乎周礼秩序的外交原则是增强国家实力的不可或缺因素，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齐桓公时期，在管子的建议下，制定了齐国的霸权原则，即在周礼秩序的框架内，以“仁”为最高准则，“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③。霸权国可以对不同的诸侯国采取不同的手段，“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④。对周边国家应该采取睦邻友好的政策，因为邻国的强弱和稳定会影响到本国的发展，与邻国关系友好是获得霸权的重要条件。齐国强大后，齐桓公问管子是否可以称霸时，管子表示称霸前还有最后一项工作需要做，就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⑤。

管子在重视恩威并施的霸权外交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仁”、“义”、“礼”和“忠信廉耻”等原则在获取、维持和实施霸权中的重要地位。“仁以天下”才能获得霸权，“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

① 《管子·重令》，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89 页。下引《管子》均出自该书。

② 《管子·度地》，第 1050—1051 页。

③ 《国语·齐语》，来可泓：《国语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5 页。下引《国语》均出自该书。

④ 《左传·闵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7 页。下引《左传》均出自该书。

⑤ 《国语·齐语》，第 331—332 页。

不可得也”^①。“仁”是霸权行为的基本原则,只有奉行“仁”的原则才能获得诸侯国的承认和霸权的合法性。国家获得霸权,也就达到了国家发展的顶峰,顶峰过后就是衰落。如果霸权国没有奉行“仁”的原则,失去人心,霸权就会衰落。因此管子一再强调:“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②

管子的霸权—秩序思想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有些相似。霸权稳定论创始人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要想获得世界经济的稳定,就必须要有有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③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进一步明确指出:“英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国际体系的相对和平与安全。”^④管子的霸权秩序观和霸权稳定论一样,都认为霸权可以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不过,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在定义霸权和霸权秩序时主要考虑的是实力要素,不太强调规范的作用。而管子强调,霸权国的外交政策应实力与规范并重,在建立霸权体系时要侧重实力,但在维持霸权体系时应侧重规范。

(二) 孔子、孟子与仁义学派

以孔孟学说为开端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极大。孔孟学说的中心内容是主张与人为善、以德治国、行“仁义”于天下,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该遵循“仁、义、礼、和、信”等道德原则。孔子和孟子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从人性出发,逐步推演到社会和国家层面,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评论和主张,构建了理想主义的仁义学派。

① 《管子·重令》,第288页。

② 同上书,第289页。

③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86), p. 306.

④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44.

孔子周游列国,每到一处,都会关注该国政治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①忠信是孔子外交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主忠信”不仅是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原则之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②孔子虽然认为华夷有别,但忠信原则却可以通行,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③孔子的信有两种,“大信”和“小信”,大信以“仁”为最高准则,是“正”;“小信”是个人的品性。当“大信”和“小信”发生冲突时,应该选择“大信”而牺牲“小信”。

和平思想是孔子外交思想的核心。孔子借有子之口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④也就是说,和平是传统美德,适用于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务,大至国家外交,小至个人修养,“和”是核心。孔子还论述了和平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⑤。虽然孔子在这里论述的是人际关系,但无疑也指明了观念认同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即不同的观念认同可以带来国家间的和谐或合作,但是,一致的观念认同也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孔子反对战争,把战争和瘟疫疾病视为同类。然而,孔子的和平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以妥协求和平,他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⑥

孔孟的“华夷”思想是对古代中原国家与周边关系的基本认识。孔子认为周边国家发展落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⑦。孟子认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⑧然而,孔孟都倡导国家间平等往来。孔子认为对夷狄之国也应实行“礼、义、忠、信”等原则,“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

① 《论语·学而》,阎韬、马智强译注:《论语今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下引《论语》均出自该书。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论语·卫灵公》,第125页。

④ 《论语·学而》,第4页。

⑤ 《论语·子路》,第107页。

⑥ 《论语·学而》,第4页。

⑦ 《论语·八佾》,第14页。

⑧ 《孟子·滕文公上》,鲁国尧、马智强译:《孟子全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下引《孟子》均出自该书。

狄,不可弃也”^①。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大国平等对待小国是仁义的表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②。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包括“仁”的指导原则、中庸的外交哲学、和平的外交理念等。孟子指出“仁”就是道,在国际体系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③。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义利”的思想。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④孟子则指出国际关系中仁义高于利益。孟子表示,国君不应该一味追求利益,追求仁义才能使国君保护自身的最大利益。国家按照利益行事终将会灭亡,“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⑤,而按照“仁义”行事则可以统一天下。

孟子明确反对霸道。他认为,霸权是毁坏礼义秩序的罪魁祸首,“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⑥。尽管霸道和王道都是国家统一天下的手段,但王道以仁义为最高原则,而霸道以实力为后盾。孟子对“义利”和“王霸”的区分开启了中国数千年的“王霸和义利”之争。

仁义学说与20世纪20—3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理论有不少相似之处。^⑦仁义学派的“仁、义、礼、信、和”等道德价值与理想主义者倡导的和平、正义、民主、自由、理性等有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把道德价值作为对外行为的准则,并以此维持国际和平;二者都主张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来影响政治精英的政治观念、改变其权力政治式的政策主张。二者间最大的区别是,西方理想主义者强调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国际和平。理想主义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国际联盟。而仁义学派没有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体系的概念,最多只有盟会的概念,但盟会并非如国际组织一样有常设的国际机构。从这一点看,理想主义比仁义学说更加进步。当然,经济、技术条件的进步也为当

① 《论语·子路》,第105—106页。

② 《孟子·梁惠王下》,第22页。

③ 《孟子·公孙丑下》,第58页。

④ 《论语·里仁》,第25页。

⑤ 《孟子·告子下》,第202页。

⑥ 同上书,第206页。

⑦ 关于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今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基础是不存在的。

(三) 老子、庄子与自然学派

老子学说以“道”为核心,在外交思想上追求一种无为自然的秩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外交哲学。老子既反对追逐权力和名利的现实主义外交,也反对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外交,因为他认为二者都是对自然存在的“道”的人为修改。“道”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际,它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和规则运转,衍生万物。“道”是宇宙间最理想的存在模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道”的原则。老子追求的自然状态与部分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假说(尤其是卢梭(Jean J. Rousseau)设想的人类初始时的和平、美好、善良的自然状态)有相通之处。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把与世隔绝的小国作为“理想国”的模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明确表示,国家人口不能过多,达到“生活自给所需而又在观察能力之内的最大数额”(后人估计所言大约不能超过万人),国土面积不宜过大,“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国家最好坐落于半岛或者岛屿之上,避免“客民入国”和外界的入侵。^①

老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一切战争。他认为兵器就是凶器,应尽量避免使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②。老子认为按照“道”,“不以兵强天下”^③。他认为儒家的仁义并不是真正的“道”,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崇尚贤能才使世人为了名而争斗不休。老子认为,按照“道”的原则行事,天下自然归心向往,“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④。

老子具体论述了国家相处的原则,尤其讨论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老子指出,两个国家友好相处,避免战争符合道的原则,也是道的体现。“夫两不相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54—358页。

② 《老子·第三十一章》,见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下引《老子》均出自该书。

③ 《老子·第三十章》,第125页。

④ 《老子·第三十五章》,第135页。

伤,故德交归焉。”^①大国应该主动放下傲气,平等对待小国,从而获得小国的信任。大国希望控制小国,小国也希望通过侍奉大国而得以延续,大国和小国要想各取所需,大国的行为是关键。大国若能做到谦虚低下,平等对待小国,就合乎“道”的原则。“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②老子认为大国是国际战争与动荡的主要原因,国家之间的和平有赖于“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③。

庄子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外交的论述,但他在继承老子“道”的基础上,批评了儒家以仁义道德为人性假设的外交思想。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的本性,儒家推崇仁义极大地扰乱了世人的本性,使世人为追求个人和国家的名利而发生争斗。“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④庄子认为,无论是追求权力、利益还是仁义道德、周礼秩序,都是人为地改变“道”,其结果都一样,无所谓“君子”与“小人”之分。

庄子还指出,富人和名人往往最不讲仁义,“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而判断仁义的原则一般是成王败寇,“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⑤。庄子把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奉为和平的理想状态,即只要国家之间不发生往来,就会天下太平。庄子补充说,崇尚智慧、技巧和方术等都是国家动乱的根源,“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⑥。由于世人都追求未知并付诸实施,战乱于是产生。

老子的自然学派思想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中还没有与之对应的学说。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存在国家和国际体系,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自然学派对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分析有着极其独到的见解。

① 《老子·第六十章》,第190页。

② 《老子·第六十一章》,第191—192页。

③ 《老子·第八十章》,第232—233页。

④ 《庄子·骈拇》,李回:《庄子译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下引《庄子》均出自该书。

⑤ 《庄子·盗跖》,第711页。

⑥ 《庄子·胠篋》,第215页。

(四) 文种、范蠡与超限制外交学派

文种和范蠡在吴越争霸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超限制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们视国家复兴、复仇和霸权为最高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交可以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礼义约束。

文种号称“远以见外”,深谙“霸王之术”^①。文种和范蠡在越国战败的情况下,认为保全越国的存在是日后复兴的基本条件,为此可以不惜接受任何屈辱条件,包括让越王到吴国为奴。文种、范蠡劝越王勾践要忍辱负重,“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②。当然,忍辱负重是为了东山再起,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在做好复仇的准备之前,国家一方面要“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全力发展生产,加紧训练军队;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韬光养晦,蕴藏实力,继续侍奉吴国的霸权,极力表现得谦虚忍让。范蠡劝告越王不要让吴国看出越国经济发展实力的迹象和复仇心理,要“匿声不见其动,以观其静”^③。

文种表示,要尽一切可能迷惑吴国,采取各种手段扰乱对方的发展。其中包括九种超常规的办法:“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曰贵粟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谗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④

文种、范蠡的超限制现实主义外交为了达到目的,完全抛弃一切道德束缚,采用贿赂、离间、迷惑等手段扰乱对方,大搞阴谋诡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信用、重礼义、重道德的主流外交思想格格不入,应该摒弃。但是,他们外交思想中一些相当深刻的反思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忍辱负重复仇十年不晚,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卧薪尝胆以图日后振兴等。

这种超限制外交学派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

① 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于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下引《吴越春秋》均出自该书。

②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第114页。

③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第139页。

④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142—143页。

(Niccolò Machiavelli, 又译作马基雅维里)的主张接近。马基雅弗利认为,“为了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为了夺取政权,可以“无限奸诈、残暴”^①。马基雅弗利认为,君主应该效法狮子和狐狸,“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②。不过,这两种以阴谋为核心的外交思想在国际社会中行之未远。越灭吴后就放弃了超限制外交政策,马基雅弗利的思想亦很少有国家采用,希特勒搞的“慕尼黑阴谋”或许算一次。阴谋虽会得逞,但不会次次得逞。其他国家上当受骗后会采取报复措施,国际社会也会视“阴谋者”为异类,长此以往,阴谋者的外交将陷于绝境。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在特定情况下使用“阴谋”,但不能以此为根本性的外交原则。

(五) 纵横家与外交谋略学派

战国时期,鬼谷子开创了纵横家学说。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战略谋划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而形成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学派。外交谋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和苏秦,二人采取了相互对立的连横和合纵外交。“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纵弱,或辅富强。”^③除了张仪、苏秦之外,苏代、司马错和范雎等也都属于连横派或合纵派。

鬼谷子指出,谋略是成功的关键,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了解人类思维习惯,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④。鬼谷子特别重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对当前情势的应对之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⑤。

鬼谷子反复说明理性决策的模式。首先,他要求决策前一定要分析事物的

①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③ 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载于刘康德:《淮南子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页。

④ 《鬼谷子·捭阖》,房立中主编:《新编鬼谷子全书》,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年版。下引《鬼谷子》均出自该书。

⑤ 《鬼谷子·反应》,第287页。

发展规律,依据一定的理论指导,“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①。其次,要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多方面了解情况,知己知彼。再次,要计算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量天下之权”,否则就会“量权不审,不少强弱轻重之称”。综合实力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测量,“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辩?能知如此者,是谓量权”^②。最后,鬼谷子明确指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③。谁都不会愿意有所失,都希望尽遇上好事。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决策者必须权衡利弊,综合各方面得失做出选择,可以“从”,也可以“横”。

张仪继承了鬼谷子关于综合实力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国家综合实力不仅指军事实力,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粮食储备、国土面积、人心向背和统治者的策略等。张仪严厉指责了秦国在春秋时期奉行仁义道德,曾三次失去称霸机会。第一次是秦楚之战,击败楚国,却根据仁义原则,遵守周礼秩序,接受楚国的求和,放弃占领楚国,从而失去一次极好的称霸机会。第二次是放弃占领魏国,第三次是秦国派兵协助他国作战。秦国不仅没有抓住这三次有利时机称霸,反而消耗了自己的实力。张仪明确主张,对外作战要彻底击败对手,灭亡对方的国家,“削柱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④。张仪告诉秦王,秦国拥有地缘优势和强大实力,秦国应该统一中国,建立帝业,而不是满足于诸侯国或霸主的地位。苏秦也曾告诉秦王,历代以来,战争是永恒的,“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苏秦批评儒家的仁义外

① 《鬼谷子·内捷》,第293页。

② 《鬼谷子·揣篇》,第159页。

③ 《鬼谷子·忤合》,第304页。

④ 刘向集录:《战国策·秦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页。下引《战国策》均出自该书。

交,指出仁义教化不仅没有使国家之间亲善起来,反而扰乱了决策者的判断,延误了各大国称霸的时机。国家要想建立霸业,臣服诸侯,“非兵不可”。^①

张仪和苏秦都重视地缘政治的外交战略。张仪认为,对秦来说,赵国是称霸的战略要地,因为赵国地处中央地带,一旦占领赵国,则韩国就可以顺利纳入秦国版图,向南可以钳制魏国、楚国,向东可以削弱齐国、燕国。只要掘开白马渡口,用水淹没魏国,魏国也就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苏秦同样看到了秦国巨大的地缘优势:物产富饶,易守难攻,周边邻国都可资利用,没有能威胁秦国安全的邻邦,特别是东边出关的通道进可攻退可守,“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以天府之,天下之雄国也”。他最初也想说服秦王统一中国,“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②,但是苏秦游说时机不当,秦王当时还没有做好称霸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张仪和苏秦分别强调连横和合纵的外交战略。张仪主要通过离间计,利用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破坏各国针对秦国的结盟。为此,张仪先后说服燕王,拆散了燕赵同盟;出任魏国宰相,离间魏齐同盟;出使楚国,破坏齐楚同盟。然后,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陆续吞并六国。苏秦在游说秦国连横失败后,转而游说燕国并获得成功,然后他先后说服了齐、韩、赵、魏、楚等结成同盟,合纵抗击秦国。战国后期,连横合纵成为诸侯争战的一条主线。^③

谋略学派与均势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均有相似之处。谋略学派和均势理论表面上都强调以联盟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实力,但双方的基本观点有所不同。连横的目的是为了“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合纵的目的是“合六弱为一强”。前者是要将整个战国的国际体系变成秦国的“家天下”,后者是为了保持战国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均势。而均势理论强调均势不是为了消灭国家和国际体系,而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体系稳定。因此,连横派与均势理论背道而驰,但合纵派与均势理论有极大相似之处。

谋略学派中的纵横家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对霸权的认识有相似之处^④,进

① 《战国策·秦策一》,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③ 此外,魏国的朱已也是合纵的积极倡导者;范雎支持连横,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

④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国家的终极政治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便宜。^①张仪搞“连横”是为了拆散山东六国的抗秦联盟,最终目的是帮助秦国吞并六国。二者的区别是,米尔斯海默虽认为国家的理想是取得体系霸权,但实际上只能获得地区霸权,体系霸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地区霸主可以采取离岸平衡战略来操纵全球均势,以达到一种于己有利的态势;张仪则认为秦国经过努力可以获得体系霸权,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六) 韩非子与权力学派

韩非子师从荀子,接受了荀子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一面,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权力和法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批评理想主义仁义学派不切实际的空想,反对现实主义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

韩非子猛烈批评儒家仁义学派,认为仁义不仅不能治国,反而误国。他首先从理论源头指出儒家思想不可靠。他认为,儒家、墨家分为多个流派,都假托尧舜的名义,“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②由于无人能够证实儒墨学说真伪,因此韩非子建议君王不要接受,以免受其所乱。从实践上看,奉行仁义外交的国家最后都因混乱、虚弱而灭亡。“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③仁义是国家衰弱的根源,只讲仁义而不顾实际情况,其结果“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④。所以,“存国者,非仁义也”^⑤。

韩非子反对仁义立国,提倡以法治国。他认为,法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

① 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文版前言。

② 《韩非子·显学》,第1125页。

③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683页。

④ 《韩非子·奸劫弑臣》,第293页。

⑤ 《韩非子·八说》,第103页。

因。“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①规定明确的赏罚原则可以满足人的名利欲望,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法治与仁治不同,法治是先苦后甜,而仁治则是先甜后苦,后患无穷。因此,君王应该从长远角度权衡利弊,“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国家要想夺取霸权,就必须实行法治,“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②。

韩非子毫不忌讳地指出,利益是社会内部和国家间政治的驱动力。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天生好利。然而,世人好利的天性并没什么不好,君王不应该加以限制,反而应利用人们好利的特点来为自身的统治和霸权服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这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源,“祸莫大于不知足”^③。人应该追求大利,对于君王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夺取霸权,为此可以牺牲一些小利。

韩非子认为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也是国家间争夺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大争之世”,权力是争夺霸权的关键。“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当今争於力”^④。权势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如何运用。“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⑤在韩非子的权力学说中,法、势、术是紧密相连的三个概念。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强调权力,在国内君主也要牢牢控制最高权力。“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韩非子认为,权力是决定一国称王称霸的决定性因素,外交策略不可能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从(通“纵”)横。诸侯言从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⑦他认为合纵连横都依赖外力,而外力往往靠不住,国家间竞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本国的权力。

-
- ① 《韩非子·有度》,第84页。
 - ② 《韩非子·六反》,第1007页。
 - ③ 《韩非子·解老》,第407页。
 - ④ 《韩非子·八说》,第1030页。
 - ⑤ 《韩非子·难势》,第941页。
 - ⑥ 《韩非子·扬权》,第137页。
 - ⑦ 《韩非子·忠孝》,第1159页。

韩非子的权力政治思想与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权力政治理论极为相似。二者都是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提出权力是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利益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国家思考和行动都是根据由权力界定的利益为中心”^①;国家不能用国内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严格地说,韩非子是反外交的。他不相信外交(在当时就是“连横合纵”)对国家的作用有纵横家所说的那样大,而认为国家间关系主要是权力之争,这从他所谓的“当今争于力”即可看出。韩非子与连横者的终极政治理想一致,那就是“一统天下”,他们的区别在于达到理想的手段不同。韩非子与摩根索在终极政治理想上是不同的。摩根索仍然要保持国际体系的存在与稳定,而韩非子则对战国时代的征战状态厌恶至极,他认为“合众为一”是解决体系不稳定问题的最佳途径。

作为本节的结尾,需要作两点补充说明。第一,在上述诸流派中的代表性人物不仅是专门立言的思想家,有的还直接参与实际外交活动。因此,在分析他们的思想倾向时,需要区别他们的思想和实际对外政策,以便做出具体分析。尤其对提倡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人物来说,他们在实际决策中可能不得不在外交思想倾向上做出妥协。第二,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子、荀子、商鞅、列子、孙子、孙臧、吴起等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都对外交问题有过研究和阐述。限于研究精力和时间,本文并未涵盖他们的外交思想,但我们希望本节内容能给有志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大致轮廓。

三、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的比较分析

为了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进行理论层次上的比较分析,我们绘制了表-1,如下所示: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p. 4—5.

表-1 春秋战国外交思想流派分类对比表

	霸权 学派	仁义 学派	自然 学派	超限制 学派	谋略 学派	权力 学派
国际环境	险恶	险恶	险恶	极其险恶	极其险恶	极其险恶
暴力的 作用	大	小	小	极大	大	极大
道德的 作用	大	大	小	无	无	无
外交目的	称霸并 维护周礼	孔子:重归周礼 孟子:统天下	自然状态	复仇与兼并	兼并/均势	兼并
外交策略	礼、力并重	遵守周礼 (或者仁义)	无为	阴谋	合纵、连横	/
对应的西 方国际关 系理论流 派	结构现实 主义与自 由制度主 义	理想主义	无	马基雅弗 利主义	进攻性现 实主义与 均势理论	古典现实 主义

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是任何外交思想的前提。从上表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外交思想流派均认为国际环境是险恶或极其险恶的。这基本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建构主义理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来划分,从春秋到战国,霍布斯文化逐步加强。当时的各派学者,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政治地位,不管他们的基本外交理念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体系竞争压力。

各派学者在如何应对体系压力的外交原则和政策选择上存在分歧。仁义学派重道德规范而轻物质实力,认为只要各国按“周礼”行事,国际环境就会由险恶转为友善。自然学派既认为暴力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也反对把某种特定的仁义道德强加于各国。^①超限制、谋略和权力三个学派否认道德规范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他们与仁义学派构成两个极端。霸权学派恰好居于其中。管仲认为道德规范和物质实力不可偏废,二者作用都很大。谋略学派中的连横者和权力学派的基本外交目标大致相同,都主张国家应该称王称霸,建立

^① 自然学派理解的仁义道德与霸权学派和仁义学派略有不同,他们认为:“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参见《庄子·缮性》,第1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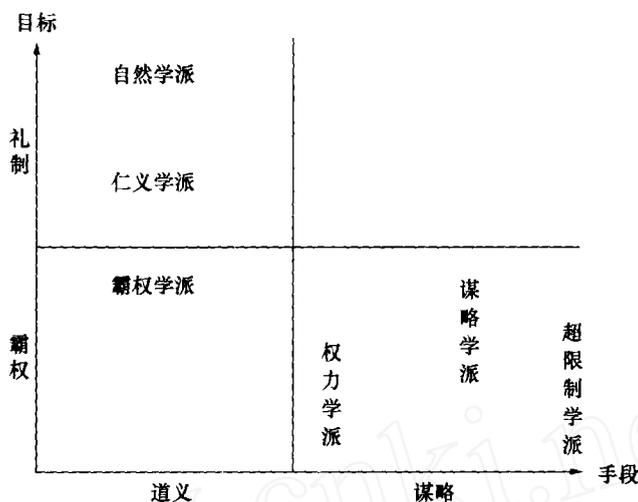
帝业,统一天下,因为在这两个学派的发展时期,周礼秩序已经崩溃。超限制学派和谋略学派都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外交策略可以不考虑道德规范。但是,谋略学派更侧重系统的战略理论,而超限制学派是吴越争霸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产物。权力学派反对谋略学派抬高谋略的作用,提出实力比拼决定一切。不过它们不是相互否定,而是对谋略和权力的排序不同。谋略学派也关注实力,但是把谋略作为决定国家成败的第一因素;权力学派认为谋略只是辅助手段,权力是最终决定因素。

霸权学派和孔子在外交目的上有共同之处,即恢复和维持周礼秩序,不同的是二者在策略上有所不同。孔子强调道德教化,主要依靠各国“自省”和自律;霸权学派则强调礼、力并举,恩威并施。在武力运用问题上,霸权学派主张少用武力;仁义学派亦非绝对摒弃武力。如果出于大仁、大义、大信的目的,出于维护礼制,使用武力是允许的。孔子就多次为管仲推行霸权外交进行辩护,认为管仲是大仁大信。

在外交目的问题上,自然学派认为改变和建立任何国际秩序的努力都违反“道”的原则,国家应该回到互相隔绝的自然状态,但是自然学派并未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为了更清晰地表明各学派的异同,我们绘制了一个坐标图,见下图。横轴表示外交手段,即道义和谋略;纵轴表示外交目标,即霸权和礼制。据此我们可将各个学派置于其中。当然,各派在图中的位置只是大致适合,不一定特别精确。比如,自然学派放在秩序一道义象限内就不是特别准确,严格地说,这一派放在哪一位置都不太合适。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演变与当时社会以及国家关系的变迁密不可分。从春秋到战国,周王室地位从中央王朝国家逐步衰落为观念上的“天下共主”国家,最后东周则仅被视为继承了中央王朝帝国的一个弱小邦国而已。相反,经过数百年的征战而生存下来的少数诸侯国则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从西周受王室严密控制的诸侯国发展到春秋时期只在形式上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诸侯国,再到战国时期的独立国家。伴随着周王朝由盛而衰和诸侯国由弱变强的过程,二者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周时期,二者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春秋时期,这种关系演变为华夏体系内宗主国



和藩属国的关系；战国时期，诸侯国和周王室的等级隶属关系已经荡然无存，周朝与其他诸侯国一起并列存在，最后由于实力弱小而被秦国吞并。

周王室的衰落是不同外交思想流派崛起的直接原因。周王室在西周初年大封诸侯的原因是为了控制各个区域，即“以蕃屏周”。为了使自己的控制合法化，当时的杰出政治家周公主持制定了周礼，用以处理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周礼对各诸侯国的身份、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畿服制”，具体就是“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①。周礼所规定的这套国际规范有很强的理想主义成分，西周时期各国基本上都是按照周礼所规定的这一套理想主义外交规范进行交往。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日益衰落和诸侯国实力的增长，诸侯国开始逐渐放弃畿服制度，不按照周礼要求办事，比如不按时朝觐天子，不向周王室纳贡，甚至对周王室的安全也漠不关心。据《左传》记载，整个春秋时期，鲁国国君仅朝觐过周王三次，鲁大夫聘周四次，作为周公后裔的鲁国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周礼为基础的理想主义外交开始“褪色”，齐桓公和管仲首先采取了以霸权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和实践。当然，齐国称霸

^① 《国语·周语上》，第2页。

的同时还要重建以周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当时各诸侯国的“尊王”观念虽然越来越淡薄,周王室地位也是江河日下,但是周礼对当时的外交实践还是有一定束缚力。比如,在春秋初年爆发的周郑战争中,郑国击败了周朝联军,并射伤了周桓王,但郑庄公不仅没有继续追杀周王,反而在战争结束后派人慰问受伤的周桓王。^①

战国时期,周礼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所剩无几,至战国后期则荡然无存。此时周王室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小小国,后又因故分裂为“东周”和“西周”,彼此不和,经常需要诸侯国调解,有时诸侯国甚至不请自来,干预王室的内政。周王室仅剩的象征王权的“九鼎”也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秦国一度发兵攻周,索求九鼎,周王室许诺把九鼎交给齐国才得以借齐国之力击退秦国,最后由于九鼎太大无法运输,途中各国也都想占为己有,齐国才不得不放弃得到九鼎的念头。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周王室至少还可以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到了战国时期这种价值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周礼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已消失,因此,不管是倡导仁义的孟子,还是崇尚权力与法治的韩非,都不再把维护周礼作为外交理想。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外交思想的不同流派及其发展变化既与思想家的社会实践有关,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是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基石,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如何发展变化,尤其是晚清末年在面对西方外交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① 《左传·桓公五年》,第106页。

作者简介

但兴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0年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本科毕业,1997年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硕士毕业,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关系。

电子信箱:xwdan2002@yahoo.com.cn

张效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外交学系讲师。1993年获得山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美国当代中国研究。

电子信箱:zhangxm95@126.com

徐春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1997年获得曲阜师范大学史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史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清史和清代档案。

电子信箱:xchunfeng@126.com

周方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2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2001年)、《东亚安全合作》(合编,2004年)。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

电子信箱:zhoufangyin@gmail.com

陈刚 外交学院博士。1998年、2001年分别在外交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电子邮件:chengang319@yahoo.com

叶自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教授。1982年和1985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8至1989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著有《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1998年)、《新中国外交思想》(2001年)、《中国大战略》(2003年)、《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2003年)。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俄罗斯政治。

电子信箱:yezi0015@sina.com

王日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级博士生。1999年和2004年分别在安徽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国际事务专业学士学位和外交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思想、西方国际政治理论。

电子信箱:wangrihua@gmail.com